

# 城市化背景下农村女性的发展与项目干预

## ——基于北京大兴区“新型农民综合素质提升工程”实证研究

蒋爱群 张莹

**摘要:**对北京市大兴区实施的“新型农民综合素质提升工程”进行实证研究,探讨城市化对农村妇女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化带来了农村妇女的发展困境,其主要原因是社会高速发展后的新形势、高要求与农村妇女的旧观念、低能力之间存在着矛盾,需要以发展干预手段帮助其完成再社会化。为了使发展干预取得较好的效果,项目设计要有性别敏感,通过满足农村妇女的实用性需要来实现战略性性别需要。

**关键词:**城市化;农村女性;发展干预

DOI: 10.13277/j.cnki.jewu.2017.02.008

收稿日期: 2016-12-30

中图分类号: C913.6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3698(2017)02-0060-06

**作者简介:**蒋爱群,女,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社会学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家庭社会学、农村社会学、性别研究;张莹,女,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社会学系2015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学。100083

城市化是指随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力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社会由以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型向以工业(第二产业)和服务业(第三产业)等非农产业为主的现代城市型逐渐转变的过程。理论上讲,城市化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应当给社会成员带来更多的福利和发展机会。但城市化的进程必然伴随着乡土社会的衰落与终结。从乡土的自给自足社会到市场的风险社会,农民和村落终结,是一个巨变,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间伴随着无数不足以为外人道的喜怒哀乐。<sup>[1]前言5</sup>城市化给农民带来了新的机遇,也带来了新的挑战。从全国情况来看,与农村男性相比,农村女性平均受教育程度更低,家务劳动负担更重,受传统观念束缚更多,学习和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更少,因此她们转移就业

比男性更困难,面对生活方式的变化表现出更多的不适应。

本研究以北京市大兴区为例,分析城市化对农村妇女的影响及她们的困惑和需求,探讨如何应用发展干预项目来帮助农村妇女再社会化。2011年至2016年5年间,笔者及所在团队深入实地进行调研,对该区的乡镇领导、工作人员以及参与项目的村民进行多次访问,本文的定性数据便来源于此。而本文的定量数据来自于“新型农民综合素质提升工程”项目历年的调查。

### 一、城市化后农村妇女面临的发展困境

大兴区位于河北与北京交界处,全镇共辖14个乡镇、5个街道办事处,户籍人口102万,常住人口150.7万,其中城镇人口102万,农村人口48.7

① 定量数据来源:(1)“新型农民综合素质提升工程”前期需求调查,共发放问卷96份,回收96份,回收有效率为100%;(2)该工程2015年评估报告,共发放6934份问卷,回收6111份,回收有效率为88.1%,按照10%等概率抽样,得到有效样本611份,其中男性249人,女性353人,男女比例为1:1.42。

定性数据来源:(1)该工程项目管理部门(区农委)每年召集3—4次乡镇项目工作人员、镇级师资人员座谈会及经验交流会;(2)2014—2015年项目结项前,中国农业大学课题组对该工程进行了项目绩效评估,在大兴区的13个乡镇(亦庄除外)对参加培训的学员进行访谈,共访谈260人,男女比例为1:1.3,女性被调查者略高于男性。

万。随着 2009 年北京市“促进城市南部地区加快发展行动计划”与 2010 年“大兴区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行政资源整合”两大战略性举措的实施,大兴区城镇化建设步伐稳步推进。<sup>[2]</sup>截至 2015 年年底,全区已搬迁 143 个村,搬迁上楼、转移就业约 11 万人。城市化改善了当地农民的生活环境,有效带动了农民致富和就业,为他们的发 展提供了较好的发展机遇。但是同时,复杂的社会变迁也使得农村家庭失去土地,家庭成员再就业风险增加,而这对于留守乡村且从事第一产业的农村妇女的影响更为显著。另外,城市化改变了原有的家庭经营方式、乡土关系网络以及相关的生活方式,加大了农村妇女对市场的依附性,这也使得她们的不适应感和发展风险增加,具体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 (一)职业技能与产业转型的需要不匹配

城市化必然会带来经济结构调整、农业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问题。在劳动力市场上,受教育程度往往被视为一个人能力和发展潜力的标志。与男性相比,农村女性特别是中老年女性受教育水平普遍偏低,而搬迁上楼将她们与受教育程度较高、有着较好经济基础和职业技能的城市人置于同一生活空间,其劣势更加凸显。

我这么大岁数了,种了一辈子地,没什么其他技能,现在地没了,也不好找工作,只能闲着呗。(样本 A, Y 村村民,女,63 岁,已农转非搬迁上楼)

由于长期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农村妇女习惯相对自由、没有约束的生活状态,对于现代企业的规范制度较为不适应,这也使得她们缺乏再就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再就业的农村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弱势地位,特别是中年妇女,多数只能从事保洁、环卫、交通协管等对技术要求较低、收入也较低的工作。同时部分农村妇女选择退回家庭而不再就业。

### (二)生活空间的挤压

调查发现,回迁的农民从原有的平房小院搬迁到高楼单元房后,他们的活动空间也受到某种程度的挤压。传统农家住宅在空间上是“开放式”的——低矮的院墙,虚掩的柴门,左邻右舍鸡犬相闻,隔着院子就能聊几句。搬进楼房后,虽然居住环境更干净,生活起居更方便,室内面积一般也没有缩小,但因为没有了庭院,家人的活动空间变小了,一些农民尤其是中老年人,感觉楼房

“憋屈”、“不接地气”。

可能年轻人爱住楼房吧,但像上了点年纪的,其实更爱住平房。我们村就有,买了楼房租出去,自己还是去住平房。觉得平房自由,大,宽敞,出个门、遛个弯也不受限制。(样本 B, H 村妇女主任,48 岁,已农转非搬迁上楼)

这种感受在女性群体中表现得更为明显。特别中年以上的女性,家庭就是她们的领地——不仅是她们生活的地方,还是她们工作的地方。在传统农村,家务劳动和生产劳动的界限是不清晰的,像家庭养殖和庭院种植,既是生产劳动,又是家务劳动,一般都是由女性负责。女人们足不出户就能劳动,还可以左邻右舍几个姐妹聚在一起,在院子里边聊天边干活,既是劳动,又是社交。上楼以后,女性不仅失去了自家的小院,而且生活缺失了一部分重要的内容——劳动和社会交往的快乐。

原先都是自己家有小院,种一小块地,养点鸡鸭什么的,基本上就能自给自足了。现在不行了,地没了,楼房也不方便养鸡,有味啊,而且以前农具什么的专门有地方搁起来,现在都没地方放。(样本 C, H 村村民,女,55 岁,已农转非搬迁上楼,目前从事绿化、保洁工作)

### (三)社会互动的冷漠化

城市化对农村妇女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居住环境改变上,还体现在居住方式所带来的邻里关系重构上。传统村落是一个靠血缘和地缘维系的熟人社会,一家一院,日不闭户,世代为邻,沾亲带故。这种乡土社会居住方式造就、维系了以差序格局为特征的社会网络,也形成了村落熟人社会特有的人际交往方式。亲朋好友串门无须事先通报,常常是推门就进;相邻几家的老人坐在一起晒太阳唠嗑,妇女们聚在某家边做活计边聊天,孩子们东家进西家出地追跑嬉戏,男人们在树下抽着烟侃大山……这些都曾是农村最为常见的生活画面。但在城市化后的大兴区,能看到这样场景的地方越来越少了。一些村在整村搬迁上楼后,虽然多数村民还在同一个小区居住,但由于小区人口密度高,没有像传统村落里那些适合大家聚集的公共空间,事实上小区里的村民很难再像从前一样开展集体活动,这使得生活重心一直在村庄和家庭中的女性感到不适应且失去归

属感。

以前夏天,吃完饭没什么事了,就在村头,有棵大树下面聊天。或者去谁家,直接推门就进了,门从来不上锁。现在不一样了,串个门也麻烦,上楼下楼的不说,还要按门铃,楼下一道单元门,楼上还一道,而且进屋之后换鞋什么的,也是拘束。现在基本不串门,有事就是打电话,或者遛弯时遇见打个招呼聊两句。(样本D,Y村村民,女,54岁,村就业指导员)

单元楼房在居住空间上的私密性与封闭性,增加了社会互动程序上的复杂性,降低了乡亲们面对面交流的机会,无形之中拉大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习惯和依赖初级群体中亲密人际交往的农村妇女,对此显然是不太接受的。

#### (四)生活资料的货币化

在传统乡村,女性是家庭事务的主要管理者,她们负责着家庭成员吃穿住行的各个方面。<sup>[3]</sup>城市化使农村妇女进入了市场经济的空间,在这种转变之下,家庭成员的吃穿住行等生活所必需的资料都主要以货币支出的形式完成,生活消费支出明显增加,原来低成本的生活方式无法持续,不少农村妇女感受到了“当家”的压力。

别看原来靠种地,收入低,但吃穿住都花不了什么钱。现在不一样了,上楼了,你说水电煤气哪一样不用钱,喝水上厕所都得花钱,比以前开销大太多了。虽然有补偿款,但楼房装修啊,置办家具啊,哪块能不用钱!(样本F,女,53岁,Z村妇女主任,搬迁上楼但未农转非)。

最让农村妇女产生社会适应困难的,是由于城市化,原有的生活资料获取来源被切断,原有的生活智慧被贬值,原有的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被拆解,而她们不得不面对一个自己难以把握的全新世界。怎样在众多的商品中取舍,如何保证食品的质量和家人食物安全,这些问题常常让她们困惑。

#### (五)农村女性社会参与度降低

在传统村落中,邻里间互动频繁,社区内联系紧密,从各户的红白喜事到村庄内的公共事务,家庭的主妇们都能参与。但城市化后,很多村庄的土地减少,有的流转给大户经营,妇女仅作为打工者,很少参与经营管理;搬迁上楼的村庄大多已没有土地和农业生产,在获得补偿款后,不少妇女选择退回家庭,呈现出低社会参与的趋势。

卡罗琳·摩塞认为,公领域的社会劳动可以通

过薪酬、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得到衡量,而私领域中的劳动则往往被认为是义务性的。这样,一旦女性从公领域退回到私领域,将导致由于没有一个客观的衡量标准,女性在家庭内的再生产和家务劳动得不到承认,从而致使个人价值得不到满足;与此同时,由于社会参与度较低,不利于农村女性观念的转变及技能的获取,也不利于其社会地位的提高。<sup>[4]266-278</sup>

可见,城市化给农村妇女造成了难以依靠自身解脱的“内卷化”困境,因此需要采取外力干预的方式实现农村妇女对发展困境的突围。

## 二、“新型农民综合素质提升工程”的内在逻辑

科学发展观认为,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核心和最终目标。及时解决城市化给农村人口特别是农村妇女带来的问题,不仅有利于妇女发展,还有助于我国城市化进程的顺利推进。在这方面,大兴区农委与高等院校合作,做了一些有意义的尝试。从2011年起,大兴区启动了“新型农民综合素质提升工程”。笔者将从该工程的设计理念、实践路径以及社会性别视角融入三个方面论述其实施的内在逻辑。

### (一)工程的设计理念

“新型农民综合素质提升工程”本质上是一个发展干预项目。发展干预项目是政府或发展机构为了特定的目标,针对特定的区域和目标群体,在规定的执行时间内和经费支持下,按照特定的实施政策和组织管理形式进行的一系列发展干预活动。发展干预项目多以妇女、少数民族、残疾人等弱势(欠发展)群体为对象,以培训、提供资金(小额贷款)、组织生产等形式,实现扶贫、促进发展等目标。<sup>[5]</sup>大兴区农村妇女所面临的发展困境,其主要原因是社会高速发展下的新形势、高要求与农村妇女的旧观念、低能力之间存在着矛盾。换句话说,是农民本身的意识、知识、能力难以适应城市化带来的社会变迁。这与欠发达地区、弱势群体由于缺少资源(观念、知识、能力、信息、资金)而难以参与发展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该工程的设计基于以下的理念:城市化不是简单的“农民上楼”,其本质是农民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由乡村型向城市型转变,由传统的农村文明向现代的城市文明转变,而最核心的是人的

现代化。如果没有具备现代思想的人,建设多少楼房也不能实现真正的城市化、现代化。因此,工程提出“以和谐发展为主题,以服务群众为主线,以培训教育为手段,以转变观念为目标,让搬迁村民人与思想一同上楼”的项目目标。在实地调查和认真研讨的基础上,项目改变了以往农民培训以农业生产技能和经营管理为主的做法,把大兴区农民关心的就业、理财、心理健康、生活方式转变等问题作为培训课程的主要内容,试图通过培训,使农民树立积极的就业观、科学的消费观和新型的生活观,帮助他们了解城市化进程及其影响,适应新的生活方式,提高参与发展的能力。

### (二)工程的实践路径

为了取得较好的干预效果,“新型农民综合素质提升工程”在组织实施上也进行了新的探索。

第一,以培训效果为导向,打破领导规定目标、专家完成任务、农民被动服从的项目实施方式,先通过调查研究了解农民的生产、生活状况和面临的困难以及培训需求,据此编写适合区情的专用教材,并且每年根据大兴区城市化发展状况对教材进行补充和更新。

第二,在高校专家的帮助下,组建本土化师资队伍,使各镇都有自己的培训教师。这支队伍熟悉本镇的情况,了解农民的需求,讲课说的是农民能听懂的语言,使农民特别是妇女、老人感觉亲切、爱听。而且本地师资就生活在农民中间,可以随时随地为农民提供辅导及帮助,从而提高工程实施的持续性与稳定性。

第三,工程采取分级培训形式,即首先举办师资班,由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培训镇级教师;然后举办示范班,由专家(也是教材编撰者)到各镇、村进行示范培训,镇级教师协助、观摩;最后是普及班,由镇级教师主讲,面向全镇各村村民进行培训。由于分级培训稳扎稳打,上下融通,保证了培训质量,也锻炼了本地师资。

### (三)工程社会性别视角的融入

由于男性和女性在社会中担任不同的角色,其面临的困难和需要也不相同,因此发展干预项目应当了解女性的需要。据此,“新型农民综合素质提升工程”努力将社会性别意识贯穿于项目的设计和实施的全过程中。

在前期的需求调查中,关注大兴区农村女性在培训需求上的特殊性。对调查问卷的分析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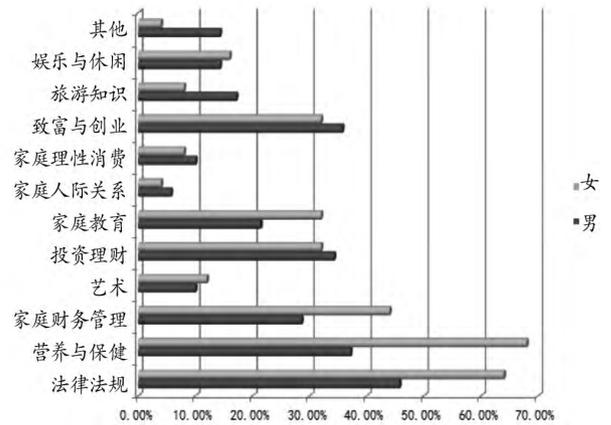


图1 大兴区农民培训需求性别对比

数据来源于大兴区农委、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课题组:《大兴农民培训需求调查报告》,2011年。

显示:女性在营养与保健、法律法规、家庭财务管理、家庭教育等方面的培训需求明显高于男性,而男性在致富与创业、投资理财、旅游知识等方面的培训需求高于女性(见图1)。这显然是中国传统的性别意识和“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的反映。发展干预项目不能忽视农村女性的现实状况和实用性需要,如果只是空喊“发展”、“平等”等“不接地气”的口号,只能使农村妇女对培训不感兴趣。重视她们的“实用性社会性别需要”,是为了进一步实现“战略性的社会性别需要”。<sup>[6]</sup>因此,工程培训内容充分考虑和满足妇女的需要,将她们普遍感兴趣的家庭教育、家庭理财、营养保健等作为课程的主要内容。但是又不止于此,不就事论事,而是从她们关心的问题谈起,但始终扣住提高素质、转变观念的主旨,结合对城市化的内涵和科学发展观的解释,探讨就业对于女性发展的作用,试图唤起妇女内心求变革、求发展的动机。

此外,在编撰教材时,根据农村女性的特点——参加培训的女性多为中年以上,有些人文化程度偏低,平时没有阅读习惯——尽量做到内容深入浅出,把学术概念变成通俗的语言,不用太长的句子和段落,并吸纳地方用语和真实的案例,增加教材的可读性;同时注意教材版面活泼,大量使用照片、漫画等(基本每页有图),与文字配合,使农村妇女爱看、易懂。

## 三、“新型农民综合素质提升工程”对女性发展作用的效果评估

城市化使农村妇女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依附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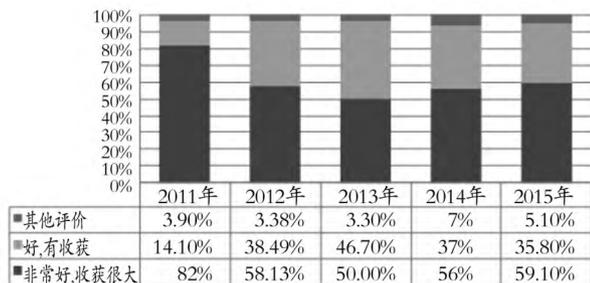


图2 被培训者对工程的总体评价(五年比较)

数据来源于大兴区农委、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课题组:《北京市大兴区“新型农民综合素质提升工程”二〇一五年评估报告》,2015年。

市场,无形之中为她们们的生活增加了许多不确定因素。在城市化的大趋势下,农村女性借助项目的平台实现了综合素质的提升。

### (一)对工程的满意度

“新型农民综合素质提升工程”设计项目周期为五年,从2011年开始实施,到2015年共培训全区14个镇的农民104046人次,如期、超额完成了项目周期的各项目标。从历年的年终评估结果来看,被培训农民对工程总体评价一直很高,认为培训“非常好,收获很大”和“不错,有一定收获”的比例合计每年都达95%左右(见图2)。

### (二)工程培训效果的综合性

调查发现,参加工程培训的农民的收获是多方面的,这也佐证了为什么被调查者对工程有很高的评价。综合来看,女性的收获更倾向于自身的感受,如“见到熟人、朋友很快乐”、“听到了一些新鲜事,长见识”;而男性在“观念改变”和“对家乡发展状况的了解”两方面略高于女性(见图3)。虽然其性别差异并不太显著,但也提醒我们思考,这是否是由于女性对情绪和感觉更为敏感,思维方式更为感性;或者是由于城市化后农村女性退回家庭,较少参与社会活动,而工程培训给她们创造了与朋友相见的机会。无论是哪种原因,发展干预项目对促进她们的社会交往、获得信息都是有帮助的。

至于工程实施最主要的目标——转变观念和提升素质,被培训农民也对其完成情况给予了肯定(见图4)。培训课程所涉及的消费理财观、心理健康观、就业观和生活观四个方面,都有四成左右的被培训者表示有明显改变和提高。性别差异显示,女性在其中三个方面的改变程度超过男性,特别是心理健康观念的改变,比男性高出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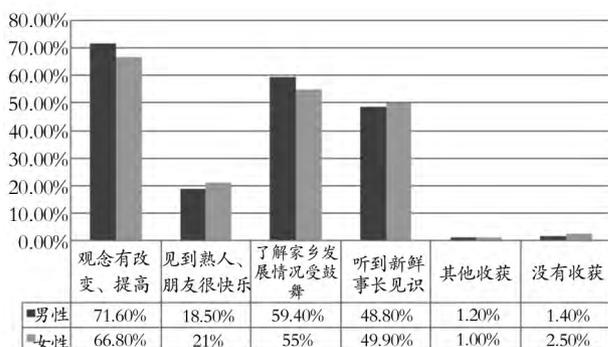


图3 被培训者多方面收获的性别比较

数据来源于大兴区农委、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课题组:《北京市大兴区“新型农民综合素质提升工程”二〇一五年评估报告》,2015年。

百分点。至于女性就业观念转变的比例低于男性的原因,可能一是与社会性别分工有关,“男耕女织”是我国社会的主流思想,即男性一般都担负着养家糊口的责任,而照顾家庭则多半是女性的职责,所以相较于女性,男性显然对就业方面的知识更为敏感;二是与被培训者的年龄有关,工程的目标群体为40—50岁的农民,女性的退休年龄多在50岁左右,所以许多女性学员已经不再外出工作,而同龄男性中仍然工作的人数比例较高,因此,性别差异对就业观改变情况的影响也就较为显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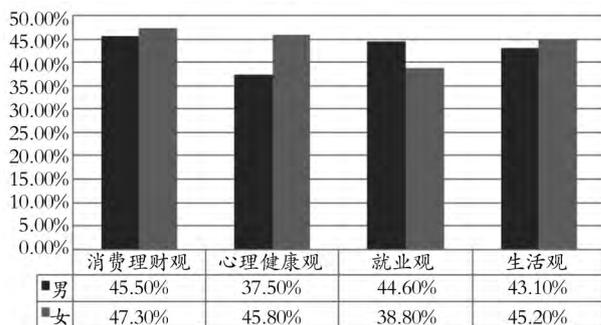


图4 两性受益人自述观念改变的比例

数据来源于大兴区农委、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课题组:《北京市大兴区“新型农民综合素质提升工程”二〇一五年评估报告》,2015年。

### (三)工程对农民素质提升的作用

“新型农民综合素质提升工程”实施五年来,观念和素质提升的效果开始显现。在2015年项目结项时进行的社会影响评估结果表明:注重身体健康、积极锻炼身体、参加有意义的文艺活动、节俭办婚事、孝敬老人、努力学习新知识和新技术等进步观念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而打牌赌

钱、炫富(如购买豪车、奢侈品等)、在家闲着也不找工作等消极现象和不良生活方式越来越少(见图5)。在这方面,作为家庭主要管理者、老人孩子主要照料者的妇女,体会更为强烈。一位妇女告诉我们:“这个培训改变了我的观念,让我能搞好跟婆婆的关系,也更好地与老公互相理解,学到的知识让我更好地教育孩子,还对我带孙子有帮助呢。你看,这工程不是影响了四代人么?”

城市化是人类社会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结果,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城市化绝不是简单的“农民上楼”,而是伴随农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改变的复杂的社会变迁过程,因此,它必然涉及个人心理和行为的改变。当这个过程发生得太迅速,就可能给农民特别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村女性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大兴区的实践充分证明,政府有关部门和学界专家应该重视城市化后出现的新情况,并且可以通过发展项目进行干

#### 【参考文献】

- [1] (法)H. 孟德拉斯. 农民的终结[M]. 李培林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 [2] 李博,左停. 农村就地城镇化过程中农民生计方式转型研究——基于北京市大兴区的调查[J]. 农业部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15 (20).
- [3] 蒋爱群,冯英利. 农村妇女在保护农业生物多样性中的作用、困境与出路[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4).
- [4] (英)卡罗琳·摩塞. 第三世界中的社会性别计划:满足实用性和战略性社会性别需要[A].王政,杜芳琴. 社会性别研究选译[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 [5] 朱晓阳,谭颖. 对中国“发展”和“发展干预”研究的反思[J]. 社会学研究, 2010 (4).
- [6] 蒋爱群,田沐冉. 通过实用性社会性别需要实现战略性社会性别需要——论中国妇女发展实践中的理论与策略[J].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 201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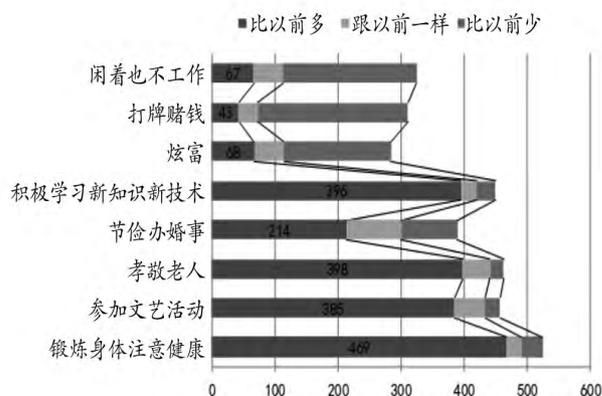


图5 被培训者对工程产生社会影响的想法

数据来源于大兴区农委、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课题组:《北京市大兴区“新型农民综合素质提升工程”二〇一五年评估报告》,2015年。

预,帮助农村女性提升能力和素质,更好地适应社会变迁,从而规避城市化的消极影响,大力促进妇女发展。

责任编辑:董力婕

## Dilemmas of Rural Women's Development and Program Intervention in Urbanization

——Based on Study of Farmers' Comprehensive Quality Promotion Project in Beijing's Daxing District  
JIANG Aiqun, ZHANG Ying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urban comprehensive impact on rural women by study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Farmers' Comprehensive Quality Promotion Project in Beijing's Daxing District. The study finds that urban development has brought dilemmas to rural women due to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rapid social development, the new demands and rural women's old ideas and low ability. Interventions are necessary to help rural people, especially women, complete re-socialization. The design of the project should be gender sensitive, meet the practical needs of rural women so as to achieve strategic gender needs.

**Key words:** urbanization; rural women; development intervention